



字纸絮语

■文/半丁

听说香港、台湾、湛江、银坑等地,全国不下十处都有惜字亭——专为焚化字纸而建筑的。对于这一点,我深信不疑,一旦纸上有了文字,便有了眉眼、就有了生命,随便处置字纸,显然是对生命不尊。整理字纸很有趣,稍一用心,就能整理出文章来。是的,将那些乱糟糟的字纸、抑或旧报刊边上自己的胡乱涂鸦一一翻捡,刹那间,灵感就会闪现:江河奔涌,花柳扶疏。去世了的书画家兼学者许图南老先生的诗句,不就是常常写在旧历纸,香烟盒上的么?

上海散文家兼诗人陈鹏举说:“……纸像天空,字是星辰,星罗棋布……纸是水面,字是飘落的桃花,桃花流水,人间春色。纸是人心,原本无瑕,原本有花之开谢,鱼之游栖,而字就是这花影鱼声……面对好纸吧,就像对待自己的内心,让流连的思绪变成字,零零落地排去……”陈先生是将纸当作土与水了,所以提笔写字,须仔细,更须郑重,那是在土上种花,在水里养鱼,一不小心,便会触落星斗,伤了鱼,损了花。

我用纸远不如陈先生那般精妙讲究:不拘任何纸,先刻不容缓地记下灵感的闪现,然后再转抄,有时甚至是故意重复地转抄——这也是我记生、僻字的办

法,最后成诗、成文。检验书与人都要经过时间的摩挲,积淀,淬火。不是有这么句话么: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新的好,只有书与人,旧的或许更好(文物除外)。我深知在气象万端的文字里,有小说家们的阅历与寄意;有诗人们的浪漫与现实;有快乐和忧伤;有冷与热。对于普通人来说,那都是通往梦想之路,只不过,一边是心灵浪花的飞溅,一边是生活山路的崎岖艰险。站在似锦如绣的春天画布前,拥抱土地的盎然生机,背负沉重苍凉的人世悲欢。

在荒寒的乡村,在知青屋忽闪着的小油灯下,我曾悄悄地试图积累文字,并不敢想象有一天它们会累及梨枣变成油印铅字。雪花和雨丝,寒星与

冷月,都从茅屋的裂隙向里窥探,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拽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,可是,支点不知在哪里——于是,在黑云压顶的日子里,在寒暑更迭中,老房东的鸡鸭,反刍的牛羊,鬻泥船上对唱的男女,甚至生产队长的雷公嗓子,以及日后打零工时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,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们,都谱入了我的咏叹调。西沉的太阳下,山坡上吹着胡须的玉米与红着脸的高粱,都鼓动着枯叶,沙沙地列阵鼓掌。我就这样卑微地在文字边缘徘徊——几十年如一日。既选择如此,就得超负荷地忍耐,以至被挤榨成粘在墙上或踩在脚底的废纸片。目下浑浑噩噩的人太多,谁让自己自觉地在

文字的边缘,艰难跋涉、试图寻找人生彼岸的呢?不管前方通向哪里,都如飞瀑直下——回不了头!

曾读过散文大家卞毓方的《书斋浮想》,他要将书桌安放在十个地方:天安门城楼、太平洋小岛、珠峰、南极冰雪、帝国大厦、巴黎圣母院……甚至尼罗河客棧。我却只想将书桌静置于大唐名流之间,这其实是唐以后千百万文人们凌晨的梦魇。听一座山峰与另一个山峰的对话,听溪流与海浪与石壁的碰撞,晨昏能得到他们的耳提面命,那将是何等的幸运?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教授在《通天崖岩敬步王阳明玉岩题壁》中写道:“……缅怀知行说,生时苦不早。倘得坐春风,窃思为洒扫”,

这不仅是对文化、对学者的仰望、敬重,更是一种对文化的痴情!

走在文字的边缘若许年,深惭还不能“废纸三千,积稿等身”,但深知大多数人在写东西伊始,总是先有了零星的思绪,包括来自废字纸的灵感,然后,再捉笔寻纸——好文章自然不会让思想缺席……突然就记起了哲学家笛卡尔曾说过:“我思故我在……”还记起了《相约星期二》教授莫里·施瓦茨,一个肌萎缩症患者,在生命的最后十四个关于人生的话题;与残疾作家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“……有限对无限的对话”……

很庆幸,我是健全的人,还不算太老,是那皱巴巴被随意扔去,复被捡起,特别是被自己捡起的废字纸,抑或是文章里可有可无的省略号?好的文章永远疏密简淡,气骨轩昂……思想,则是开在盘根错节的老树上的新蕾!



那些充满友善的老街坊地名

■文/朱同

镇江,是一座南北文化交融的移民城市。千百年来,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方言的人们来到这里,着意培养对第二故乡的亲近感、认同感、归属感,于是,就有了同德、同鑫、同兴一类街坊地名。同德里在宝塔路广场附近,清初有谈、高、聂、王、陈五姓在此建屋,为表示同心同德共建美好家园,故有此名。同鑫里在九如巷附近,晚清有李、于、张三姓人住,取名同鑫里,表达了团结互助共同富裕的愿景。同兴里在小街西侧,也是类似的意思。1949年命名互助巷(宝塔路),1957年命名互助巷(京畿路)。这些地名,是一种宣示,也是新老市民的庄重约定。淳淳民风,可赞可叹!

镇江人的友善,突出表现在善待弱势群体,善待老人、孤儿和残疾人。大西路民国春街附近有条三善巷,因清代巷内设老人堂、育婴堂和盲人救济处三家民间慈善团体得名。宝盖路上有条冬赈局巷,所谓冬赈局,纯属民间慈善团体,每到寒冬腊月向贫苦人群发放寒衣寒食。尽管解放后改称生产巷,但当地社区,近年又努力恢复冬赈局门墙原貌并挂牌纪念。

镇江人的友善,还表现在一种给他人留有余地的宽容。清真寺街至山巷曾有条东西向的小巷叫留余巷。晚清晋商黄先生曾在这里买地皮建了三进楼房,预留四尺宽余地供他人行走,故名留余巷。近代大实业家张謇在镇考察闻听此事大为感动,欣然命笔

题写“留余”二字镌刻在巷头券门之上。虽然十年前拆迁后留余巷不复存在,但张謇的“留余”石碑被市民保护下来,由市博物馆收藏。类似的地名还有清真寺有余巷、电力路附近的堂留巷,以及附近尤唐两家互让三尺传说而由油炭巷改称的尤唐巷,各自演绎出邻里友善相处的生动故事。

镇江人的友善,扎根于普通民众,也深深感染着彼时文人和社会名流。上世纪30年代初,本地文教界四位著名人士——赵吉士(图书馆专家,曾任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馆长)、张海澄(省镇江一中前身、私立京江中学首任校长)、法度(1927年至1952年任本市女子职校校长)、包明叔(新江苏报社社长),结伴在正东路北侧建宅,取名尚友新村,意谓崇尚真

正的朋友(语出《孟子》);又有赵棣华、李韧哉、严惠宇三位爱国实业家,结伴建大康新村。他们敢于摒弃文人相轻、商人尔虞我诈陋习,择善而居携友共处,算是民国时期镇江地名文化的两朵奇葩。

镇江人的友善,焕发出一种真正的人间大爱,这就不能不说到与老中山路平行的博爱路。上世纪30年代初,中山路与博爱路几乎同时兴建,前者以中山先生之字命名,后者以中山先生之魂命名,相得益彰互为表里。那26亩青青桑园,以及守望这片桑园至今犹存的“箴庐”,曾是博爱路上最重要的地标,彰显了民国时期古城一位杰出女性的无私奉献和博爱情怀(另文介绍)。谁料1965年受极“左”思潮干扰,

博爱路硬被改为健康路。周边城市如南京、常州,都保留了博爱路这一老地名,怎么号称大爱之城的镇江就保留不住呢?有人说,博爱西方资产阶级的“发明”,错!首倡博爱的是中国人:春秋时期孔子宣言“仁者爱人”,战国时期墨家力主“兼爱”,唐代韩愈最早提出“博爱之谓仁”(《原道》)。建议有关部门适时恢复博爱路这一老地名,以传承友善大爱的城市文脉。

